不自信，无以立国。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近日，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应邀作客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专题讲述“文化与自信”，他激励大家——

中国文化是一种值得自信的文化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王翟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魂和根”，“文化自信是最重要的自信、是最综合的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坚持用创造的精神来实现中华文化的转化”，“以创新的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近日，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应邀作客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专题讲述“文化与自信”。两个小时的讲座，不仅让近700位观众亲身领略了国学精粹的独特艺术魅力，更激发了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自古以来被中国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现场，王蒙旁征博引，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内涵与命运，以及新时期文化建设等内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文化自信包含着对文化认知、文化改革、文化自我更新能力的自信。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要局限于对过去、对文本的研究，而要讲究“经世致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元性”和“变化性”

文化是立国之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尚文”。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对中国人非常重要。因为，儒家所推荐的就是“文化理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说，你用政治手段来引领、用法律惩治手段来规范，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更好的方法是用道德来引领人民，用礼法、礼貌、礼节、礼仪来规范人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你就像北极星一样，用你的道德示范作用和教化作用来立国，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而孟子的“仁者无敌”更是凸现了这一特征。他说，你只有在道德上有示范作用，你的政权才是有力量的，才可以得民心，进而能得天下。能做到爱人民，也能做到被人民所爱，你是没有对手的。由此，得到了民心的王者，而不能够得到天下是不可能的。

“所以，到现代我们还要强调，以德优先。在实际生活中，任用干部人事工作首先要考虑‘德’。”王蒙表示，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万法归一”，意思是治国平天下靠道德教化和示范作用。因为，人性是善良的，实行道德教化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民心。“而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文化的手段，文化做得好，政治才搞得好。”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种哲学化的思路，就是主张“一元化”。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个“一”指的是天下所有道理都是相通的，但并不是独裁的“一”、专制的“一”，一个呆傻的“一”。

“中华传统文化在讲‘一’的同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变化性。”王蒙告诉大家，庄子提出“与时俱化”，意思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件东西都在变化；《尚书》中记载，孔子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说你有什么事办不通了就要变。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是有它的传统和根源的。

改革开放使中华传统文化焕发了新活力

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当时，中国的生产力、GDP、科举制度、文学在全世界都是最顶尖的。然而，这种盛况从明朝以来就开始显出颓势。尤其是在1840年以后，我国经历的已经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焦虑、文化危机。

从明朝以来，我国的文化为什么会开始显出颓势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太‘无敌’了。”王蒙说，“当时，中华地缘文化、地缘政治受不到任何挑战，没有对立面，大家都学它的。但是一种文化长期停滞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变化，一开始很美好的东西就会变成老一套，一开始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它就变得枯燥乏味，一开始大家极有兴趣的、接受的东西就变成了成年老醋、成年老酱，中国文化已经碰到了停滞，已经碰到了僵化和老化的问题。柏扬就曾用‘酱缸文化’一词，来形容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痛彻的反思激活了中华文化，给了中华文化以生机；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文化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使人们有了文化自信的可能和基础。”王蒙告诉大家，改革开放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适应能力、调整能力、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把握步伐的能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豪情。如今，党中央又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提出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转化发展。如，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提法，映射出来的正是中华文化统筹兼顾、中庸务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辉。

这些正与中华文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强不息、不进则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变革观，还有“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的精神相对接。

实现衡阳文化自信，要加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

王蒙表示，文化的概念非常宽。按国内的说法，文化是以文来教化人；按世界上的说法，文化就是除了原来自然存在的东西以外，一切人类的经验、积累、智慧记载以及物质成果。“譬如，到了衡阳就一定要吃鱼粉，这说明衡阳有鱼粉文化；到了衡阳就要游南岳，这有南岳文化；我们这儿有石鼓书院，而且还有石鼓讲坛，这就是研讨文化。”

那么如何加强文化建设呢？王蒙认为，首先，每个人要具有文化精神，就是对我们最根本的、自古以来被人们所接受、至今仍然有影响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的选择能力；其次，要保护好、研究好本土的文化资源，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这种传统文化，以此来提高大家的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第三，文化的根基就是抓好教育。衡阳有12所高等院校，我们要在做好教育的基础上，增强对文化资源的宣传、保护、发展，如通过旅游来弘扬文化资源和文化气氛等；第四，多举办一些阅读或读书活动，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如石鼓书院的传统、湖湘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学里面的湖湘学派传统；最后，要打造一些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此来提高文化遗产的知名度。

王蒙应邀作客石鼓书院大讲坛

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王蒙表示，一定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对传统文化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要从教育做起，从读书做起，从学习做起，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乃至于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内涵，加倍珍惜中国革命文化的成果、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

钱钟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倏同”，意思是“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学问，它的原则、方法不是分裂的；不管是南海那边的，还是北海这边的，他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是相同的”。

对此，王蒙深有感触，他表示，石鼓书院大讲坛的举办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在这里讨论国学，不仅仅是围绕古代的学问而讨论，而是让它能够联系实际、让它接地气，能够和今天的世道人心结合起来，和今天的发展任务结合起来。石鼓书院大讲坛若想越办越好，就必须进一步扩展讲课内容。因为，只有丰富了才能够长久。”

■相关链接

王蒙简介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中国当代作家、学者，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他，60余年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传世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活动变人形》、《青狐》、《闷与狂》等十余部；中、短、微型小说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伊犁》、《尴尬风流》等二十余部；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双飞翼》、《红楼启示录》、《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天下归仁》等；还有大量的评论集、散文集、诗集；出版《王蒙自传》3卷，《王蒙选集》4卷、《王蒙文集》45卷、《王蒙文存》23卷。

■王蒙代表作解析

《青春万岁》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一部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的长篇小说，是王蒙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1952年北京女二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品主要描写了郑波、杨蔷云等一些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的女学生——如天主教会“仁慈堂”中长大的孤儿呼玛丽、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二小姐苏宁、一心想当科学家，对集体和他人缺乏热情的李春等人的热心帮助，使她们最终都能融入到学校这一大家庭中来，共同进步，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学生们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和很高的思想觉悟。同时作品中也穿插描写了郑波和杨蔷云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学习成绩，以及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之间的不成熟的、朦胧的爱情故事。

1981年，该作品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并于1986年获人民文学奖。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优秀作品。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篇小说曾被打为毒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又获得正确的历史评价，被称为“重放的鲜花”。

这篇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写的是青年教师被调到区委会后，在工作和斗争中怎样碰壁和怎样遇到挫折的故事。它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揭露了我们党委机关内部已在滋长并亟待克服的官僚主义现象。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通过对比，塑造了刘世吾、韩常新、林震三个主要的人物形象。刘世吾性格比较复杂。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有能力、有魄力，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抓重点，“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却不主动去抓工作。对于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漠然置之，麻木不仁。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的“职业病”。他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他一再说“就是那么回事”，这句口头禅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淡，革命意志严重衰退。小说还深刻揭露了他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他就是用这些来掩盖和庇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这就使这个形象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韩常新是另一种类型的官僚主义者，是“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边上，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典型。林震是与刘世吾、韩常新对立的人物，也是作者笔下的中心人物。他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是个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

船山故里国学飘香
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

诗话衡阳

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

■宋之问

浮湘沿迅湍，逗浦凝远盼。渐见江势阔，行嗟水流漫。

赤岸杂云霞，绿竹缘溪涧。向背群山转，应接良景晏。

沓障连夜猿，平沙覆阳雁。纷吾望阙客，归桡速已惯。

中道方溯洄，迟念自兹撰。赖欣衡阳美，持以蠲忧患。

诗歌赏析：此首五言古风是宋之问从流放地泷州（今广东新兴西）返回，途经衡阳时作。湘源可能指湘水之源。潭州，即长沙，当时衡山属潭州管辖。前面八句，都写沿途山河景色，欣喜看到衡阳美景。此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诗人笔下的江河、急流、赤岸、云霞、绿竹、溪涧、夜猿、阳雁、飞舟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一水一仙、一木一石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而最终归结“衡阳美”，并依靠这种美，可以忘忧去患，由此这首诗的社会价值更高了。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致使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也加强了。

用典释义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

【讲话原文】

中共各级党委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提供支持，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谈会上的讲话》

【出处】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涣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因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谲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天意得矣。”

——（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王涣之传》

【解读】

王涣之（1060—1124年），字彦舟，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据《宋史》记载，王涣之生性淡泊，恬于仕进，常言：“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出现日食，经大臣推荐王涣之应召入朝言政。他劝谏新君：“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希望徽宗“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意思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无论所言逆耳还是顺耳，只要是正确意见都应当听从。徽宗“欣然延纳”，并想任命他为谏官、御史之职。王涣之以“臣由大臣荐，不可以居是官”为由，坚辞不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他指出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博大襟怀。

（据《学习时报》）

国学教育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中一开始就有儒家文化，甚至在吐鲁番等地方成为主流文化——

丝绸之路也曾儒学兴盛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从《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可知，早在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时代，一些疲惫的士兵就留了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中一开始就有儒家文化，甚至在吐鲁番等地方成为主流文化。

这种军事移民还发生在西域的其他地区，比如楼兰。早在晋代，儒家文化就通过帝国派驻的官兵和随军家属在楼兰地区盛行开来。

“移民潮”带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五胡内迁，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凉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却比较安定。这导致了一种后浪推前浪式的移民潮。首先是中原汉人迁移到敦煌等西北地区，敦煌汉人又迁移到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区。中原向河西移民、河西之间的移民、河西向西域的移民浪潮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移居西域的“汉魏遗黎”，有相当一部分是敦煌、凉州一带人氏。北魏灭北凉时(439)，北凉后主兄弟率户万余家，自敦煌北奔高昌。所以，高昌上至诸王豪族，下至黎民百姓，与敦煌、凉州渊源甚深。这些移民一直以华夏文化为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视自己为晋之正统，虽然河西和西域屡易其主，但对汉文化的认同不忘初心。

不仅如此，西域的近邻北魏也崇尚儒学，这对西域一带的儒学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经典从北魏引进高昌，高昌王麴嘉居功至伟。《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载高昌人将孔子等人画像挂在厅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实这一习惯可能也来自北魏。高昌受北魏的影响甚巨，高昌官职“绾曹郎中”就来源于北魏，“绾”是个典型的北魏汉语词，“绾”具有“掌管、统领”义并用于行政术语中，最早见于《魏书》和北魏墓志。

如果说古代西域的儒学受到河西和北魏的影响甚巨的话，这还只是其外因，古代西域的儒学兴盛还有一个内因，那就是教育的发达。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在西凉时代，郡即置博士。由此可知，西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在传世文献中也得到印证。

高昌国时代的儒家文化普及深入人心

古代丝绸之路的儒学还受到梁朝的影响，唐西州的孔氏本《论语》郑注并非来自中原，而是来自高昌国，而高昌国又可能是从梁朝引进的。

在高昌国时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仅有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有大众化的知识普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献中有“义学生(义孝生)”“私学生”，即私家学习儒家经义的学生，也指官家或私人出钱资助（供给食料），免费上学的学生，包括乡里坊巷之学生以及私塾等。

古代吐鲁番人注重儒学教育，这从墓砖、蒙书和人名、地名可以看出。在不少高昌国时期的《墓表》里，生动地记述了这里的达官贵人的儒学修养。从吐鲁番出土蒙书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太公家教》是唐西州学生的抄写本，其用典多来自经史文献，主要宣扬儒家的忠孝、礼义、尊师、重贤、修身、勤学、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思想。

不仅如此，古代吐鲁番的人名和地名也体现了他们对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观念的信奉。高昌国的佛教寺院也讲授儒家的“孝”道。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存五行，第一行抄有“孝经解”三字墨书，当为标题，第二行以朱书记述抄写之人云：“释比丘戒妙，孝经一。”

此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宣传儒家文化人物的正史写卷，这也证明当时此地对儒家文化的信仰。比如，德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唐朝前期抄本《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之残片。

高昌儒学具有浓厚的北方儒学特点

唐太宗继位后，对儒学高度重视。《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条：“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可见唐朝未灭高昌之前，高昌国依然派学生前来唐帝国学习儒学。

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对高昌人的怀旧情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由于高昌的儒学长期受到北魏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北方儒学特点，与唐代融通南北的儒学还有所不同。我们相信在唐灭高昌的一段时期内，原有的高昌儒家经典和注文还会存在下去。难怪唐西州的《论语》有那么多的郑氏注写本，有不少《急就篇》写本，但同时又有大量的《千字文》《开蒙要训》写本，这些都说明，唐西州的儒学既有唐代儒学的总体特色，又有高昌国时代传下来的地方特色。

（据《光明日报》）

本报地址：湖南省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台路33号 总编室电话：0734—8686268 发行部电话：8223670 邮政编码：421001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衡广字(1995)006号 广告中心电话：8247111 8243140 印刷：衡阳日报社印刷厂